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的几点变化

黄 育 馥

提 要 中国研究已成为当前国外学术界的热点。与 20 多年前相比,今天的美国中国学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主要表现为研究条件的变化、研究队伍的变化、研究内容的变化、学科地位的变化和组织形式的变化。

关键词 中国学 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图分类号 K207.8

一、早期美国关于中国的研究

1784 年(乾隆四十九年)8 月 30 日,第一艘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进行丝茶贸易,美国商人开始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中美关系就此开始。^① 1830 年,第一批美国公理会教士随同来华的美国商船在澳门登陆。此后一些美国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一方面从事传教活动和兴办教会学校,努力传播西方文化,扩大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和控制;另一方面深入这个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神秘的东方国家,了解它的政治、经济、社会、民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并将这些情况提供给美国政府,为其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正是在这些传教士中间产生了早期重要的美国汉学家。

与欧洲一样,美国早期的汉学也是以人文科学研究为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只占据极为次要的地位。到 20 世纪以前,虽然美国汉学还没有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但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起步。早期美国汉学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在组织建设方面,最重大的事件当属 1842 年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成立;在资料建设方面,一些图书馆陆续开始建立中文馆藏;在人

才培养方面,汉语教学进入高等学府。

但是,世界上最早的汉学研究是在欧洲出现和兴起的,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汉学起步较晚,而早期活跃在美国的许多汉学家都有着在欧洲学习或工作的背景。受欧洲汉学的影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仍是以人文科学研究为主,且侧重于对古代中国的研究。截止到 1940 年,美国大学培养的研究非西方世界的博士生大多研究古代,研究现代的还不足 60 名。^② 这种状况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发生重大改变。

从 20 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在中国研究上所取得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相继成立了一批从事亚洲研究或东亚研究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其中不少都与中国研究有关。虽然它们还只是初露头角,且鲜有以“中国研究”命名者,但对于美国中国研究架构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并标志着中国研究的学术性和规

^① “美国历史大事年表”,见 <http://usa-guide.dongyu.net.cn/History/years.htm>。

^② Szanton, David L., 2003.

范化程度的提高。^①

(2) 中国研究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取得发展。继1901年哥伦比亚大学建立最早的东亚研究系并开办中文讲座之后,一些大学陆续开始中国研究,并逐渐形成各自的特色。汉语教科书的编纂工作也开始进行。

(3) 由于一些基金会的积极支持,使得美国中国研究的发展有了经费保障。^②

(4) 资料建设取得进展。一些图书馆开始收藏中文图书。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这一时期还加强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著作的翻译和出版。

纵观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可以说是初步搭建起了中国学的研究构架,并在为冷战时期形成具有美国特色的中国学准备条件,但美国中国学的真正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二、冷战时期的美国中国学和费正清时代

美国当代中国学作为一个领域,大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政府、基金会和学术机构开始重视发展当代中国研究的必要性。在这方面,福特基金会决定出资3000万美元用于建设东亚研究领域就起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同样,《国防教育法案》对学习所谓“重要语言”(包括现代汉语)的学生颁发政府奖学金的决定也起了推动作用。^③

然而,由于1949年以后中美关系长期紧张,中国学研究举步维艰。当时美国中国学家面临的客观困难主要有:(1)研究资料匮乏,几乎完全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文件;(2)没有在中国大陆从事实地研究的机会;(3)无法与大陆学术界进行学术交流。

而美国中国学主观上的问题是,当时它的研究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官方意志的左右,从一开始就怀着一种“刺探敌情”的心态,主要是为了对最新情报进行分析和为决策服务,而不是长期的学术研究。衡量一名中国学家的学术生涯是否成功,往往要看他是否得到一份华盛顿提供的工作,而不是看他是否出版了一本开拓性的著作。一些中国学家在观察中国和对数据进行解释时配戴着政治的透镜,严重妨碍了他们正确客观地认识和研究新中国。

现代美国中国学的创始人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被誉为“中国学之父”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费正清认为,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每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背后,都存在着一个更加严峻的挑战,即必须努力理解中国文明和美国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他认识到,中国近代革命的深刻原因不仅在于与西方的接触,还在于她本身的历史。这种看法在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汉学界却并未成为普遍的共识。^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费正清回到哈佛,并担任历史系教授。在此后的年代里,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研究。虽然对于他的评价尚有争议,但他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创立和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1)打破传统汉学的束缚,改变以往汉学研究重历史、轻当代,重人文科学、轻社会科学,重西方观点、轻中国现实的状况,为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学研究模式而大声疾呼,并撰写了大量具有开创性的著述。(2)加强基础资料建设,编纂了多种学术工具书,为中国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提携后进,培养人才,造就了新一代中国学家。他的不少学生后来成为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队伍的中坚力量。(4)致力于中国学的学科建设,于

^① 如美国外交政策协会(1918)、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议(1919)、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1919)、对外关系理事会(1921)、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1923)、太平洋学会(1925)、布鲁金斯学会(1927)、哈佛燕京学社(1928)、美国远东学会(1938)、亚洲研究协会(1941)、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等。这些机构都研究涉及中国的问题。

^② 如20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中国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包括为促进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向美国大学提供资助和建立中国研究专业图书馆。在1932~1947年间,远东课程教师保持在3人或3人以上的美国大学和学院大约有10所。这些院校几乎都接受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其中华盛顿大学是最先接受资助者,因此也是接受资助数额最大的大学,从1932~1946年,该校共接受资助13.415万美元,1947年接受了10万美元。见Zi Zhongyun, 1995。

^③ Perry, Elizabeth, 1999.

^④ Fairbank, John King, in <http://www.fas.harvard.edu/~fairbank/JKF.html>

1955年在哈佛大学建立东亚研究中心,确立了当代中国学的学术标准。对于世界各地的中国学家来说,这个中心是一个加强理解的论坛;而对于选择中国专业的学生来说,则是培养专业研究人才的摇篮。^①此后还有一些从事中国学研究的中心也是在他的支持下由他的学生建立的。

应该指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的盛行曾给亚洲问题专家以及大学和政府机构中的许多人造成深深的伤害和恐惧。有些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也受到指责或怀疑,甚至成为联邦调查局调查的对象。许多学者不得不在保持学术良心、道出逆耳的真相,还是接受巨额的研究经费之间作出选择。一些学者则作为“潜在敌人”的研究者,充当了美国政府的顾问。

尽管如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还是取得了显著发展。这段时期,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机构大量涌现。统计分析表明,1946~1978年期间新成立的此类机构有180余个。虽然其中也有少数反华或反共组织,但多数机构为加深美国和中国的相互了解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到1978年,美国共有188个机构出版中国学著作;1979年在大学中任教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博士约1000人,中国学家(不包括研究生)约3000人。^②此外,这一时期的美国中国学虽然面临着研究资料严重匮乏的困难,但仍有一些学术图书馆或资料中心成立,其中许多是设在大学内的东亚研究系或中心。据统计,到1975年6月,美国90多所大学图书馆和东亚图书馆的中文藏书达140万册,400余万册。^③

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的美国中国学研究

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中美关系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尤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美国中国学也进入了一个发展、变化和重建的时期。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资深研究员华尔德(Andrew G. Walder)认为,重建美国当代中国研究“起自1979年。……中国不再被视为一个边缘的神秘话题,它已经移上了中心舞台”。^④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即研究条件的变化、研究队伍的

变化、研究内容的变化、学科地位的变化和组织形式的变化。

1. 研究条件的变化

(1) 研究资料的获取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中国学家能够看到的只是极少数的中国官方报纸、公开出版物和通过秘密途径找到的政府文件,对他们来说,即使中国大陆的地方报纸也是稀罕之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家们逐渐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浩如烟海的中国报刊、图书和大量的公开或内部文件,而他们的任务则是如何对这些资料进行筛选、分析和研究。据美国东亚图书馆理事会(CEAL)统计,到2003年6月30日,美国50个主要的亚洲研究机构共有中文藏书7922378册,占全部东亚图书馆藏(14388389册)的55.06%;2002年6月30日~2003年6月30日新增中文图书341438册,占全部新增东亚图书(533163册)的64.04%。^⑤

从馆藏内容来看,除图书和期刊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资料。据2003年6月30日的统计,美国的东亚图书馆共有中文缩微资料326184种、图表资料13902种、音频资料1369种、电影/录像资料3239种、DVD资料1387种、计算机文本资料372种、光盘2876种。^⑥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图书馆在美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中国学研究也从这场深刻的技术革命中受益匪浅。例如,早在1996年以前,美国学者、中文图书馆员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等机构就共同创建了中国25个朝代历史全文数据库。^⑦2000年,西蒙斯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

① Fairbank, John King, in <http://www.fas.harvard.edu/~fairbank/JKF.html>

② 孙越生、陈书梅主编,1993,第1~11页。

③ 同上,第612页。

④ Walder, Andrew G., 2002.

⑤ Holdings of East Asian Materials of North American Institutions as of June 30, 2003, in http://www2.lib.ku.edu/ceal/stat/20022003/ceal/stat15431102_03.pdf

⑥ Electronic Resources of East Asian Materials of North American Institutions as of June 30, 2003, in http://www2.lib.ku.edu/ceal/stat/20022003/ceal/stat15431102_03.pdf

⑦ Sinology By Computer? Session 99, ROUNDTABLE, in <http://www.aasianst.org/absts/1996abst/china/c99.htm>

学、台湾大学等高等院校设立“建设中国学全球数字图书馆合作研究课题”，参与各方汇集其珍贵馆藏，构成中国学全球数字图书馆的核心馆藏，以方便各国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使用。^① 2003 年，美籍华人图书馆员协会 2000~2001 年出版委员会发起建立“北美欧洲中文馆藏数据库”(NAECCO)，以帮助用户获得有关北美和欧洲高校中的中国学研究计划和中文馆藏的信息。^② 图书馆数字化无疑对中国学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2) 实地学习和研究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前，美国中国学家中间几乎没有人到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对台湾和香港移民的访谈就成为他们“实地”研究的重要内容。虽然在 70 年代初尼克松访华后，一些美国教育界人士和学生曾有幸到中国旅行，但均如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中国学家普遍强烈地感到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脱离。

1979 年秋，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 (ACLS) 组成的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开始派送学生到中国大陆学习语言，不久又向社会科学的大学和学院派送研究人员。众多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师生改变了以前“去台湾学语言，去香港做博士论文”的老路，直接到中国大陆开展实地调查，并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的第一手资料。

随着中美教育交流的开展，来华的美国留学生逐年增加。从 1979 年到 1983 年，共有 3500 多名美国学生和学者来华学习或从事研究。1996 年年底，在华美国留学生人数为 826 人；1999 年达到 2573 人，人数在各国在华留学生中居第三位；^③ 2001 年在华的美国留学生超过 5 万人，其增加速度已经超过了其他国家，占全体在华留学生的 33%。目前每年大约有 3000 名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④

受中美学术交流影响最大的领域是中国学。中国学家更多地接触到了中国的文献资料，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社会，大大提高了汉语水平，同时也促进了汉语教学在美国的发展，来华学生的学历也有所提高。这里仅以富布赖特基金会资助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的奖学金计划为例：从 2002 到 2005 年，无论是富布赖特基金会收到的申请到中

国(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留学的学生人数，还是获得奖学金的实际人数都有所增加；此外，在准备到中国大陆留学的美国学生中，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数也在增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美国中国学研究队伍素质的提高。(见[表 1])

表 1 富布赖特基金会为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提供奖学金的情况(2002~2005 年)

留学地点	资助对象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学年		学年		学年	
		申请人数	资助人数	申请人数	资助人数	申请人数	资助人数
中国大陆	学士/硕士	37	10	72	10	不详	10
	博士	29	15	46	15	不详	20
台湾地区		55	14	62	14	不详	25
香港地区		21	不详	23	不详	不详	不详

资料来源: Fulbright Grants for Graduate Study Abroad, 2003/2004 Competition Statistics, in <http://www.iie.org/Content/Navigation.Menu/Fulbright-Demo-Site/U-S-student-program/Fulbright-Grant-Opportunities/CompStats.pdf>

(3) 合作研究的开展

1979 年以后，中美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教育和科学交流。从美国的私人机构到联邦政府，都迅速对此作出热情的反应，并设立了多种交流计划。中美教育和学术交流的发展远远超乎当时人们的想象，并成为美国对外学术关系中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部分。美国中国学家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开展合作研究的机会也从无到有，大大增加。在中美建交后的前 10 年内，到美国学习访问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约有 3 万人，超过了从 1860 年到 1950 年赴美人数的总和。^⑤ 据中国教育部统

① Project Web Site: CMNet (Chinese Memory Net); U. S. - Sino Collaborative Research toward a Global Digital Library in Chinese Studies, Project summary, in <http://www.dli2.nsf.gov/internationalprojects/sino/CMNet.pdf>

② <http://international.ucla.edu/asia/article.asp?parentid=3951>

③ Key Events in Sino-US Relations, in <http://dawning.iist.unu.edu/china/bjreview/97Nov/97-45-2.html>

④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200202/26/eng20020226_91018.shtml

⑤ A Relationship Restored: Trends in U. S. - 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 ~ 1984 (1986), in <http://www.nap.edu/execsumm/030903678x.htm/>

计,1978年,美国只有50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①而从1978年到2002年,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数超过了38万人,美国已成为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②仅2001年一年,就有大约7.8万人在美国留学,其中多数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这些中国学生和学者遍布美国各地众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的出现为美国人了解当代中国,为美国中国学家研究中国提供了便利。

中美两国的研究机构之间也陆续建立了合作关系和交流计划。自1979年以来,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美国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共同支持中国研究,并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育委员会等部门建立合作关系,促进中美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它们实施派送美国研究生和博士后到中国从事长期研究的计划、中美高级学者短期交换计划、双边会议计划和在某些领域的合作研究计划。这些计划得到美国政府机构、基金会和企业的支持。^③

到90年代初,一批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中国学者为合作研究进一步拓宽了道路,其中包括中美学者共同规划和管理样本调查或实地研究计划,共同分析和发表最后的研究数据资料。合作研究课题的范围广泛,形式多样。90年代以后,这种交流更加频繁和普遍,研究条件不断改善,合作研究不断增加,一些以前不可能进行的社会科学方面的课题也开始实施。^④

2. 研究队伍的变化

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中国学家的构成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

(1)以传教士身份出现的中国学家逐渐绝迹,传教士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已经成为历史。到20世纪下半叶,虽然仍有一些与中国有关的宗教组织存在,但其主要目的是传教和慈善事业,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学研究。

(2)女性中国学家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随着世界对女性问题的重视程度增强,中国学家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有所增加,女性研究在美国中国学研究中已经争取到一席之地。^⑤

(3)中国学家的汉语水平显著提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中学和大学内学习汉语的学

生人数逐渐增加。据《现代语言学学会报告》调查,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中,汉语在最普遍讲授的语言中已经从排名第八上升到排名第六。^⑥20世纪80年代以后攻读中国学的博士生已普遍能够使用汉语进行研究,并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无疑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4)具有中国背景的美国中国学家增多。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生和学者进入美国中国学家的队伍,并因其对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熟悉和了解而对中国学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对被收入《北美汉学家辞典》^⑦的509名美国中国学家的初步调查统计表明,其中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43人,占8.5%。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随着学术职称的升高而比例下降。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学者在美国学术界中尚立足未稳,同时也说明这支相对年轻而庞大的队伍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加强。(见[表2])

在美国中国学家的队伍中,还活跃着众多早期在美国定居的华裔学者以及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总体来看,他们到美国的时间早于大陆学者,其中不乏优秀的资深学者,一些人还担任了系、研究所或专业学会的领导职务。他们的国学基础比较扎实,研究范围广泛,其中一些学者在中国学方面颇有造诣,对美国中国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①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2002/02/26/eng20020226_91018.shtml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Thurston, Anne F.; Turner-Gottschang, Karen & Reed, Linda A., 1994, *China Bound Revised: A Guide to Academic Life and Work in PRC*,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in <http://www.nap/openbook/0309049326/html>

⑤ 黄育馥, 2003, “从性别的视角看美国的中国学研究”, 《国外社会科学》, 第4期。

⑥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ducation about Asia*, Volume 1, Number 1, 1996, in <http://www.intac.com/~quick/chart1.htm>.

⑦ 安平秋、安乐哲主编, 2001。

表 2 被收入《北美汉学家辞典》的美国中国学家的背景分析

职称	总数	其中来自大陆的学者人数	%
教授(含研究员)	239	4	1.67
副教授(含副研究员)	145	11	7.59
助理教授	99	23	23.23
被收入《北美汉学家辞典》的中国学家总数	509	43	8.5

资料来源:安乐哲、安平秋主编,2001,《北美汉学家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

3. 研究内容的变化

国外中国学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一个多世纪以来,众多的美国中国学家以其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对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进入 20 世纪以后,中国学逐渐呈现出三个重要特点,即研究的学科范围扩大,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并重,并出现了跨学科的研究;研究的时间跨度加大,对古代、近代与对现当代的研究并重;研究的问题深化细化,几乎涉及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改革中的中国为中国学家们提供了一片尽显才能的广阔天地。

美国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和美国学术团体亚洲研究协会(AAS)是两个代表着不同的研究出发点和侧重点的机构。前者成立于 1946 年,是美国第一个被称为“思想库”的机构,其使命是通过研究和分析为美国政府决策服务。后者成立于 1941 年,是一个非政治、非营利,向所有对亚洲感兴趣的人开放的学术团体,旨在促进学者间的接触和信息交流。本文拟以这两个不同性质的研究机构的成果为样本,具体说明近年来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内容。

兰德公司下设的亚太政策中心(The RAND Center for Asia Pacific Policy, CAPP)是研究美国和亚洲的关系以及亚洲面临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的机构,其研究重点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和人力资本问题。在该中心近期的 9 个研究重点中,有 3 个与中国有关,由此可见它对于中国研究的重视。^①对兰德公司的出版物进行内容分析的结果表明,兰德公司对中国的研究以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为主,绝大部分是对中国重大时政问题的研究,这与它作为美国政府智囊团的性

质是一致的。例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中尤以中苏关系研究为主,体现了冷战时期美国对于中苏关系的密切关注。80 年代以后,有关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研究升至首位,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研究的比例也比 1980 年以前有明显增加,反映出改革后的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美国对中国的新的关注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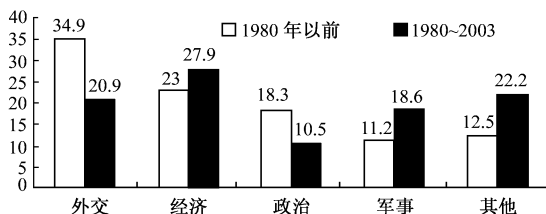


图 1 兰德公司中国研究出版物内容统计(%)

资料出处:SUBJECT INDEX, in <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bib/SB2002.pdf>

如果说兰德公司对中国的研究主要反映了美国官方关心的问题,那么,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历年年会上发表的论文则更多地反映了学术界广大中国学家关注的问题。在 1995 年到 2004 年的历届年会上,共发表有关中国研究的论文 2282 篇,其中 80%是由美国中国学家提交的。这些论文在研究的时期、学科和问题的覆盖面上都远远超过了兰德公司。对这些论文的主题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从研究的时期来看,它们覆盖了从古至今的各个历史时期;从研究的学科来看,它们涉及到历史学、哲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艺术学、考古学、语言学、教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法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图书馆学、信息学、文献学、建筑学、医学、植物学等众多学科;从研究的问题来看,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历史回顾到未来预测,古往今来中国的方方面面——大到中国的大政方针或国际角色,小到乡镇企业或下岗女工——均有学者进行研究。可以说,作为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并在世界上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的东方大国,中国的一切都在强烈地吸引着美国

^① We Make a Difference, in <http://www.rand.org/nsr/capp/about.html>

的中国学家。^①

近年来美国中国学刊物也有所增加。1993年出版的《美国中国学手册》介绍了225种刊载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的期刊,其中冠以“中国”字样的刊物有52种。^②200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研究中心网站公布了一批中国学学术刊物的名单,在名称中有“中国”二字的美国刊物25种,其中17种是《美国中国学手册》中没有出现过的刊物。^③新增刊物中,史学类、文学类和语言学类刊物占47%,而有关中国的综合类刊物和政治学、经济学类刊物占53%。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天的美国中国学注重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倾向。^④

4. 学科地位的变化

与美国区域研究的情况一样,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与专业学科的紧张关系,其中尤以与经济学的关系为甚。中国学家通常很少了解或关心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情况。他们很少阅读学科的刊物,而且绝少在上面发表论文。即使他们知道自己所属学科中的理论和研究焦点,也对它们感兴趣,但通常也不知道如何将它们的研究与它们联系起来。美国各主流学科认为,中国学家所从事的根本不是什么跨学科研究,而是非学科研究。这种状况使中国学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经历了发展、转型和知识上的重新定向,在中国研究和学科研究的整合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使得中国学与主流学科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大大缓解,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消失。事实上,关于当代中国的某些研究不仅已经进入主流学科,而且已经成为某些学科内部的分支领域。美国斯坦福大学的A.魏昂德教授(Andrew G. Walder)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国学的转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并不存在的新的中国学。他指出,今天的中国学家从其各自学科关注的问题出发开展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科对话的一部分,他们使用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也得到这些学科的承认。这一方面是由于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得以用过去根本无法获得的数据资料来探讨本学科内部长期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学家提出了大量新的研究

课题。推动美国中国学在主流学科中发展的则不仅有抓住了新的研究机会的老一辈中国学家,还有以前对中国没有兴趣,如今却被中国研究所吸引的社会科学家。大量的这类研究是中国学家和非中国学家合作的结果,它们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研究的内容——同时帮助中国学家进入各自学科的主流。^⑤

中国学与正统学科的结合最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三大学科。魏昂德指出,有关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争论将中国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90年代初,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发展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人们围绕着中国的经济改革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取得成功展开了争论;其次,人们关注中国的经验与东欧的问题究竟有没有关系;第三,如何解释中国许多经济部门的活跃表现。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的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成为学者们热心研究的课题,并相继有一些成果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AEA经济视点杂志》(*AEA'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比较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等重要的经济学刊物以及世界银行和开发银行的出版物上发表,有些刊物近年来已经成为发表有关中国经济的学术论著的主要园地。

在社会学领域,中国学研究的主流学科的结合

① 亚洲研究协会每年举办一次为期4天的年会,会议期间与会者们就研究和教学中以及各种亚洲事务方面的问题进行研讨,中国问题是学者们研究和探讨的重要方面。如2004年年会上有关中国的研究论文占全部论文的39%。1995年以来历届年会论文提要可见ANNUAL MEETING ABSTRACTS, <http://www.aasianst.org/absts/main.htm>。

② 孙越生、陈书梅主编,1993,第661~681页。

③ UCLA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CEAS), CEAS Educational Resources, *Asian Studies Journals: China*. in <http://www.isop.ucla.edu/eas/journal/china.htm>

④ UCLA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CEAS), CEAS Educational Resources, *Asian Studies Journals: China*. in <http://www.isop.ucla.edu/eas/journal/china.htm>

⑤ Walder, Andrew G., 2002.

合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在两份主要的社会学刊物中（《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和《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研究的文章；另一方面，在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刊物《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中也开始发表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中国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还发表在《管理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和《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等刊物上。事实上，在1988年以前，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学术成果在主要的社会学刊物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但在1992年以后这类成果却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与经济学和社会学相比，中国学研究在政治学学科中的兴起比较缓慢，变化也较小。在政治学领域，有关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改革的政治影响和国家在促进市场导向的增长中的角色，其重点不是研究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和中国改革的成就提出的一些一般性理论问题，而是传统的区域研究与政治学学科的结合。这些成果涵盖了当前人们极度关注的一些领域，如城市移民的增加、腐败的因与果、农村地方选举、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或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等，体现了更多的学科性。近来《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已经开始刊登一些中国学研究的成果，但大量的成果是发表在两种主要的比较政治学刊物上，即《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和《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无论如何，中国学研究成果被刊登在主流学科的重要刊物上，这本身就表明了该学科对中国学的尊重。

在一些长期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科中（如历史学），近年来的中国学研究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朱政惠教授在其“裴宜理教授的中国学研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访谈记”一文中引用美国华人学者黄宗智的观点说，黄宗智教授“强调美国的中国学界正出现一个崭新趋势。这就是社会科学综合研究趋势和跨学科研究趋势，以及研究对象的革新趋势。他将战后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及其学者群体的发展划为三个阶段（又为“三代说”），第一代以费正清、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列

文森（Joseph Richmond Levenson）为代表，重点是政治史和人物思想传记；第二代大体以帕金斯（Dwight Heald Perkins）、施坚雅（George William Skinner）、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孔飞力（孔复礼，Philip A. Kuhn）为代表，特点是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第三代以反帝史、经济史、民众运动史、地方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主题‘自统治人物转移到社会基层的广大人民’。他认为这是‘影响更为深远的’‘新倾向’，反映了现代西方史学的一种普遍潮流（注：参见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①朱政惠教授还指出了第三代学者十分注意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以认识现实、揭示其未来走向作为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关注当代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同时注意对中国作动态的、全方位的细致观察和探讨；重视研究方法的变革和从事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等特点。^②

上述情况表明，今天的美国中国学正在逐渐脱离原来孤立的区域研究，而逐渐融入学科研究的领域。事实上，中国学研究已经成为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的结合体，成为一个新的快速增长的社会科学综合学科和跨学科研究领域。活跃在这一领域中的不仅有老一辈的汉学家和年轻一代的中国学家，也有一大批来自不同学科的、对中国问题情有独钟的专家学者。他们把原来所从事的学科视为自己的学术故乡，并通过研究中国为各自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不同的学科背景为他们观察和研究中国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共同促进了中国学领域的繁荣。

中国学学科地位的提高使得中国学家有了更多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今天，到政府部门工作仍然是中国学家的一种就业选择。除在政府机关、学术机构和教育机构就业外，他们还可在日益发展的中美经济贸易、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众多领域内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职业。加利福尼亚州立

^① 朱政惠，2001，“裴宜理教授的中国学研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访谈记”，载《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见 http://www.google.com/search?hl=zh-CN&lr=&ie=UTF-8&inlang=zh-CN&q=+site:www.hubce.edu.cn+%E8%B4%B9%E6%AD%A3%E6%B*85。

^② 同上。

大学(长滩分校)亚洲和美籍亚洲人研究系认为,现在,人们普遍承认亚洲研究(包括中国研究)为从事许多职业和专业提供了强有力的背景,这些人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都有着广泛的就业机会。^①

5. 组织形式的变化

(1) 机构形式的变化

20世纪以来美国中国学在组织形式上的最大变化是大批灵活的研究中心、研究所和研究计划的出现。这种趋势在近几十年内一直持续着,并有所发展。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通常被纳入“亚洲研究”或“东亚研究”的范畴,直接以“中国学研究”命名的研究机构很少。中国学研究主要在以下几类机构中进行:一是官方设立的研究机构(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等部门);二是非营利的民办研究机构(如布鲁金斯学会等);三是大学中的系和研究机构;四是公司企业中的研究部门。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的区域研究(包括中国学)在美国的大学中不再单纯以系的形式(如“东方语言文学系”或“亚洲研究系”等)出现,而越来越多地采取了“研究所”、“研究中心”或“研究计划”的形式。在我们目前收集的251个设在大学内的与中国学研究有关的机构中,研究中心、研究所和研究计划占一半以上。它们通常不提供奖学金,不过,通过组织或支持多学科的系列讲座、研究课题、研讨会、培训班、出版、馆藏计划等多种多样的活动,吸引了来自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和专业院校的师生,并常常会成为新老学者交流知识、开展研究的中心,既反映了研究的新发展,也体现了当代美国中国学多学科、跨学科的性质。例如目前仅哈佛大学就有10余个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机构。^②

(2) 机构的经费来源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得到美国政府部门、大学、学术团体、基金会或企业的支持。如美国教育部每年都拨款支持高等院校中的“国际教育”(包括外语教学计划、区域研究和国际研究项目)。2004年的资助金额为28714534美元。^③

大学是组织和资助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王安博士后奖学金”、哈佛燕京学社与北京大学和夏威夷大学

联合设立的“中国学高级研究年度奖学金”、奥尔巴尼大学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和地区比较研究中心的“中国城市研究奖学金”、斯坦福大学的“中国学博士后奖学金”、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生补助和奖学金”等都为美国学生和学者从事中国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经费支持。^④

中国学研究还得到学术团体的资助。如2003~2004年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为拥有博士或同等学历的美国公民设立到中国进行研究的计划,并提供最高为3万美元的奖学金。^⑤

基金会仍然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重要资助来源之一。福特基金会、亨利·卢斯基金会、富布赖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等都长期资助中国学研究。如1988~1998年间,亨利·卢斯基金会的“美中合作研究计划”曾资助中美学者合作完成了49个研究项目,内容涉及考古学、文学、语言学、艺术史、法律史、社会和政治文化和经济学等多个学科。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还得到其他国际组织的支持(如世界银行)。不少中国学研究机构利用国际机构的资助,独立或与其他机构共同承担研究项目,进行自身的资料建设,或是与国际机构共同主办国际研讨会等,推进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行之间的交流。

五、结 语

回溯美国中国学百余年的历史,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走过的路程,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学自身的形成、发展、成熟和创新,更看到了它所

^① Department of Asian and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AAS),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in <http://www.csulb.edu/depts/as/>

^② <http://www.harvard.edu/listing/>

^③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http://web99.ed.gov/GTEP/Program2.nsf/9f7174e36cc662958525645d005843b9/126194ff55a27c68525659b00582060?OpenDocument>

^④ UCLA Asia Institute fellowship opportunities, Category Search; Chinese Studies UCLA, in <http://www.isop.ucla.edu/eas/fellowships/studychna.htm>

^⑤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MERICAN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IN CHINA, (CSCC), 2003 - 2004 Competition, INSTRUCTIONS TO APPLICANTS, American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in China, in www.acls.org

反映的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在上地位的变化。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这块有着13亿人口的土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正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教授罗德明(Lowell Dittmer, 1942~)指出的,“虽然解放后的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是研究的对象,但‘改革中的中国’——即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时期——却是最重要的”。^① 如今的中国对世界的吸引力已经不仅仅限于它古老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以及蕴藏其中的无数神奇故事,还在于它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所创造的令天下人瞩目的新的奇迹,在于它的和平崛起以及它在世界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内所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这些新的奇迹,使美国人越来越关注中国,使得中国学研究成为一种必要,也为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参考文献:

1. 安平秋、安乐哲主编,2001,《北美汉学家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
2. 孙越生、陈书梅主编,1993,《美国中国学手册》(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 A Relationship Restored: Trends in U. 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1984 (1986), in <http://www.nap.edu/execsumm/030903678X.html>
4. Business Institu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China, SSRC, 2002/02/14, in <http://www.ssrc.org/programs/business-institutions/business-institutions-economic-development-and-social-change-china/>
5. Electronic Resources of East Asian Materials of North American Institutions as of June 30, 2003, in <http://www2.lib.ku.edu/ceal/stat/20022003/ceal/stat1543110203.pdf>

6. Perry, Elizabeth J., 1999, The PRC and American China Studies: Fifty Years, 1999年在“观察中国50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于2003年9月18日在网上发表,见 <http://www.gwu.edu/~sigur/asiapape.htm>。
7. Fiscal Support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and Collections in North America, From July 1, 2002 Through June 30, 2003, in <http://www2.lib.ku.edu/ceal/stat/20022003/ceal/stat1543110203.pdf>
8. Fairbank, John King, in <http://www.fas.harvard.edu/~fairbank/JKF.html>。
9. Selden, Mark, Asia, Asian Studies,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A Symposium, Introduction, in <http://esf.colorado.edu/bcas/sympos/syselden.htm>
10. Szanton, David L., 2003, The Origin,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CAS Edited Vol. 3,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in <http://repositories.cdlib.org/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58&context=uciaspubs/editedvolumes>
11. Walder, Andrew G., 2002,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1977~2002, Produced by The Berkeley Electronic Press, UCAS Edited Volumes Vol. 3 [2002], Article 8, in <http://repositories.cdlib.org/uciaspubs/editedvolumes/3/8>
12. Zi Zhongyun, 1995,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CHINA, in <http://www.mgyj.com/american-studies/1995e/9505.txt>

(本文作者:女,1945年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100732)

(责任编辑:澄清)

※

※

※

^① Dittmer, Lowell, RESEARCH IN CHINESE POLITICS, in <http://www.polisci.berkeley.edu/Courses/2000/syllabus/spring2000/ps244syllabus.html>